

CRISIS  
IN

宋  
史  
論  
文  
選  
集

AND PROSPERITY  
SUNG CHINA

原著：*John Winthrop Haeger*

翻譯：陶晉生 等

世界學術譯著

CRISIS  
IN

宋  
史  
論  
文  
選  
集

AND PROSPERITY  
SUNG CHINA

原著：*John Winthrop Haeger*

翻譯：陶晉生 等

國立編譯館出版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五月初版

# 宋史論文選集

Crisis and Prosperity in Sung China

定 價：新台幣壹佰伍拾元整

原著者：柯睿格等

翻譯者：陶晉生等

主譯者：國立編譯館

印行者：國立編譯館

地址：台北市舟山路二四七號

電話：3626171

傳真：3629256

印刷者：普辰電腦排版

地址：台北市濟南路三段25號2樓

電話：740-7766

ISBN 957-00-5902-8

## 譯序

本書除第一篇論文，“宋代社會：在傳統之內的變遷”，是譯自遠東季刊 (*Far Eastern Quarterly*) 第十四卷(1945)外，其他諸文皆譯自約翰海格爾(John W. Haeger)所編宋代中國的危機與繁榮 (*Crisis and Prosperity in Sung China*.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75)。一九七一年，海格爾組織了“第二次宋史研討會”(Sung II Conference, 第一次在巴黎舉行)，在德國慕尼黑南郊的一個小鎮費達芬(Feldafing)舉行。危機與繁榮一書中諸文都是當時參加者所提的論文。本書包括其中有關社會經濟的幾篇論文，及一篇思想史方面的文章。柯睿格的“宋代社會：在傳統之內的變遷”一文也和宋代的社會經濟發展有關，特別是都市化。這篇文章似從來沒有介紹給國內讀者，所以雖然發表的時間早得多，也譯載於本書。

柯睿格是美國漢學界研究宋史的前輩學人，曾以討論宋代文官制度和社會流動，名重一時。任教於芝加哥大學時，作育了一代宋史後進。“宋代社會”一文所徵引的近人著作，仍有不少至今還值得參考。柯氏關於北宋都城開封的論文，討論開封的特殊性格，與作為政治中心為主的歷代都城不同。尤其強調開封的商業活動及其對社會的影響。

斯波義信現任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及所長，專長為中國經濟史、商業史及宋代經濟史。他的論文詳細探討宋代長江下游的市場發展與都市化，利用了大量的原始資料及近人的研究。例如南北人口的分佈，南方佔65%，北方35%，以及都市人口數，修改了柯睿格的數字。他對市場分佈，貿易路線，貨幣流通，市場專業化，以及商業網的形成等問題

的論述，增進了我們對於宋代華南的商業發展的了解。

馬伯良的論文闡述宋代對特權的限制，並申論宋代上層階級若干特權的喪失，顯示政治權力由於經濟的發展和科舉制度的影響而重組，影響的深遠，及於鄉村。馬氏現任教於亞里桑那大學(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謝文熙將宋代鹽的生產、專賣、政府的鹽稅收入、對鹽生產的控制、及其弊病等問題，加以詳細的敘述。謝氏現任司密斯研究所(Smithsonian Institution)客座研究部(Resident Associate Program)副主任。

謝康倫現任紐約市立學院(City College of the City of New York)教授，主要研究範圍為宋代思想史。他的論文詳細敘述偽學之禁的來龍去脈，分析被列偽學之黨及攻擊偽學人物的生平和學術背景，認為打擊偽學是政爭所導致的，其中還有私怨的成分，似與和戰之爭、學術派別，以及社會背景沒有特別的關係。

## 譯者簡介

陶晉生任教於美國亞里桑那大學東亞學系。劉靜貞博士係東吳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李今芸曾任歷史月刊企劃部主任，現與耿立群任職於國立中央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何冠環自亞里桑那大學東亞學系獲博士學位後，現任職於新加坡科技學院。

# 宋史論文選集

## 目次

- |                  |                   |     |
|------------------|-------------------|-----|
| 1. 譯序            |                   | (1) |
| 2. 宋代社會：在傳統之內的變遷 | 柯睿格著<br>陶晉生譯      | 1   |
| 3. 宋代的開封         |                   |     |
| ——實用的都市和形式化的國都   | 柯睿格著<br>陶晉生譯      | 13  |
| 4. 長江下游的市場發展與都市化 | 斯波義信著<br>李今芸、劉靜貞譯 | 47  |
| 5. 宋朝的財政特權和社會秩序  | 馬伯良著<br>李今芸、劉靜貞譯  | 87  |
| 6. 南宋鹽政之地區管理     | 謝文群著<br>耿立群譯      | 113 |
| 7. 論偽學之禁         | 謝康倫著<br>何冠環譯      | 159 |

## 英文目錄

1. Preface (1)
2. Sung society:Change within Tradition E.A.Kracke,Jr. 1
3. Sung K'ai—feng:Pragmatic  
Metropolis and Formalistic Capital E.A.Kracke,Jr. 13
4. Urban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s in the Lower Yangtze Valley  
Yoshinobu Shiba 47
5. Fiscal Privileges and Social Order  
in Sung China Brian E.McKnight 87
6. Reginal Control in the Southern  
Sung Salt Administration Edmund H. Worthy 113
7. Neo—Confucianism Under Attack:  
The Condemnation of Wei—hsüeh  
Conrad Schirokauer 159



# 宋代社會：在傳統之內的變遷

柯睿格著

陶晉生譯

當我們談到中國的社會變遷時，我們腦海中時常湧現以下兩種圖畫之一。(註1)一種是我們今天目擊的變遷，從外國來的激進的新觀念、技術和力量動搖了傳統的社會秩序，快速地，有時是猛烈地改變了舊日的模式。另一種是朝代循環的觀念，承襲自傳統中國史家，有時加上一些我們自己的看法。國家的整個政治和經濟秩序的具有特色的循環時常反映了(也許影響了)一個皇室的政治時運：從成功的適應和控制到不適應和動亂。如果我們只注意這些因素的話，每個循環的終結留下的中國社會大致仍與上一次的循環結束時相同。但是這一看法近於忽略了中國社會在不同層次上發生的質的變遷。

本文論及的社會變遷則與上述兩種有別。在中國和在西方的文明中一樣，長期的、繼續不斷的社會發展與傳統觀念、生活方式以及新看法、技術和活動的模式之間的互動相伴而生，後者在內部演進或來自他方。有時候發展的過程緩慢，有時候則甚至在某些方面倒退，中國的生活方式卻仍然在世世代代中經歷了累積的改變，基本上無法回頭。有時候變遷的力量互相影響，以致集結的動力幾乎在社會上的衝擊是革命性的。這類快速的和深遠的變遷的一個顯著的例子可以從宋代得到，時間是第十至十三世紀。

在宋代達到如此戲劇化的節奏的這一運動，在若干方面其開端可以追溯幾個世紀。這一運動的第一個可以清楚地察覺到的一方面，也許是中國

人口的大量移動，從北方的平原走向崎嶇的南方和東南沿海。在西元後的幾個世紀內，受到經濟困境和外來侵略的壓迫，這種遷移已經開始；但是，遲至八世紀中葉，長江流域以及以南地區僅有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四十至四十五。到了十三世紀末，這一地區據說已經擁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甚至百分之九十的人口，而且百分之二十的人口已存在於福建和浙江東部的東南沿海。(註2)

華南富饒的三角洲成爲中國主要的糧食生產區。一些經濟上的結果已爲人熟知，不必在此複述。爲了戍守北邊軍隊的給養和地處華北的首都的供需，中央政府致力於大規模的擴建從南到北的運河系統以及補助運河的陸上交通。新建設也幫助私人商業的迅速成長。毫無疑問的，移居在遙遠的南方沿海的人必需從原來居住的地方輸入工具和產品，並用當地的亞熱帶物產來作交換，又以這些產品和南海甚至印度洋地區交換。(註3)在海上與波斯和阿刺伯的接觸比較容易，加強了海外商業的成長，不久沿海都市裏的印度和阿刺伯商人就增加了。以羅榮邦在他的“海上霸權的中國”一文中指出，中國人也轉向大海，在向海發展的民族中獲得了領導的地位。中國內部的商業，原先局限於少數人享用的奢侈品，也於此時擴展其種類，及其對國內大眾的重要性。

地區間貿易的成長，帶來了錢幣的使用，很快的，錢幣的多種用途超越了舊式的物物交換。到了十一世紀，一種有規則的紙幣系統已經在運作，而銅幣的鑄造量則超過了任何一個傳統的朝代。資金的移轉和信用的措施也在發展。(註4)經濟上，中國的各地區已經不再是自給自足的了，而是在生產方面——糧食、日用品、或服務——日益專業化，因此也互相依存。十一世紀時，中國的經濟明顯地經由上述的發展，比任何過去的時期都來得複雜。

隨著這種經濟發展而來的社會變遷，我們至今只有一幅很不完全的景像。但在文獻中可以看見某些極爲突出的方面。也許一個具有關鍵性的重

要的方面是大都市的變遷的角色。前此的有名都市成爲大都會及達到經濟上的重要地位，是由於它們成爲國都。這些都市的對稱和規則的布局，是以皇宮爲中心的，呈現了其源流和目的證據。但從十世紀到十三世紀則不然。在這段期間內，被選作國都的是那些已經由於位於交通線上的據點而發展成爲貿易中心的重要城市。

宋代的第一個都城開封特別代表了這種情況。開封本來是一個地區的行政中心，位於從華南到北方大運河的主要轉接點，在唐以後動亂的時期裏，其地位因能獲得南方米糧的供應而被重視。開封的商業上的重要性與日俱增，舊城以外的郊區，一次又一次被新建的城牆包容於市區之內。在十六英里長的外城之內的空間極爲可貴。宋代的第二個君主放棄了他的皇宮的擴建，因爲爲擴建的話將強制拆除一些私人的住宅區。這段歷史的結果是，雖然開封位於黃河流域的平原，它缺乏較早的都城的對稱，而這種對稱在日後使北京城突出（也是因爲政治上的性質）。（註5）

宋代後來的都城杭州也是因爲其貿易中心的重要性而於一一三五年提升了其政治的地位。杭州有巨大的人口：宋末杭州城內的人數估計達九十萬，而郊區還有六十萬。（註6）

十一至十三世紀的都城雖已因其性格偏於商業而成長，它們的超越地位卻受到其他依靠商業活動的大都會的挑戰。在西元一一〇〇年之前，至少有四個都市的人口遠超過首都。我們沒有關於市區內或郊區人數的準確資料，但是人口調查報告指出以上四個都市都在其府轄區內有百萬以上的人口——府轄區大致可以和大倫敦區或大紐約區比較。這樣的人口集中情況似乎遠超過當時歐洲最密集的城市，即使是後者的最大的估計數字。

在以後的兩個世紀中，都市繼續成長，有幾個地方的人口顯然於一二九〇年之前已加了兩倍、三倍或四倍。其中最戲劇化成長的三個例子是分佈在東南沿海（杭州、蘇州和福州），一個（饒州）則近於從長江到廣州的內陸貿易線，據說一二九〇年福州約有3,875,000人，表示極深刻的人口集中

現象。(註7)

就在這個時刻，在宋代滅亡後不久，馬可孛羅以忽必烈汗的使者的身分巡訪這些地方。我們熟知他對杭州的繁華和泉州貿易情況的描寫。但是他也觀察到當時人口調查數字顯示的現象，即小城鎮的衆多及其成長。他描寫從杭州到福州(直線航程少於三百英哩)的旅程說，經過了至少六個“大而高貴及美麗”或“高貴而偉大”的城市，而且這些城市之間的旅途中他至少七次記載“常常看到非常美麗和非常偉大的城市和鄉村”；在一段兩天的旅途中他說，這些城鎮“如此常見而且不斷的出現，以致似乎你是在走過一個城市而已。”(註8)就算這位老中國通渲染和誇大，馬可孛羅所見東南沿海地區應當在都市發展方面超過了他的家鄉意大利，當時的意大利是歐洲都市化最發達的地方。中國東南沿海的大部份地區都是山地，不適宜於農耕，但是可耕地都已完全使用了。有一個宋人的記載，高度發展的農耕已經把從前無用的土地轉變為帝國中最肥沃的農田；而且當馬可孛羅有時提及他所見的牲口(黃牛、水牛、山羊、豬和家禽)，以及某些特別農作物時，他所描述的不只是農田，而是“美好的園圃。”

這些農田雖然肥沃，卻為數過少。沿海地區的繁榮仍然有賴於礦產、商業、工業、茶和海產的收入，而在河谷的沖積地以外者應仍然存在著無人居住的邊遠地區。馬可孛羅旅行中的四程提及“獵獲野獸和鳥類”，並且多次提到兇猛的大“獅子”(老虎?)侵擾旅客，以致部份的行程至少是“除了大家結伴前行外，這些地區是非常危險的。”(註9)因此，在這個看來大部份很少人居往的區域，在工業和貿易方面則急速發展，成爲一種典型，很容易推想到我們西方文明發展過程中邊疆地區的機會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那些人住在這地區中成長的都市裏呢？我們的印象並不清楚，但是至少有一些有關其性格的線索。和較早的時期一樣，城裏應當有相當大數目的文武官員，根據中央政府的規定居住一定的時間，同時還有比較駐守得

長久些的吏員；在較寬敞的處所駐紮了軍隊；也有沒有獲得官位的家境富裕的文人，以及較貧窮的文人（以教書糊口，或仰賴諸如為代書和說書之類的職業維生）。再就是大小商人和工匠，以及處於經濟上最低層的勞工。有鑑於前述這些都市的巨大，商人、工匠和勞工大都構成都市居民的一大部份。在宋代覆亡約十年後，馬可孛羅的觀察應與宋代人口的構成相去不遠：他所見的杭州與福州間的六個較大的城市之中，他談到四個城市的居民“以貿易和手工業維生，”並且間接的暗示商業活動，重複的提及“生活的必需品極為豐富，”而且非常便宜。（對其他的活動則甚少提及）（註10）

就比較有限的程度來說，這一區域的情況也許也在當時其他地區比較不密集在一起的大都市可以見到。所有的都市都由類此的商業連繫着，也經常出現長途旅行的商人。

現存的記錄只告訴我們首都中商人的活動和生活方式，但是在這些方面有兩個不同的區域也呈現了一幅類似的圖畫。

商人、工匠以及從事服務行業的人組織了行會，行會對其會員具有使其就範的權力，雖然這些組織在城市的一般行政方面並沒有扮演什麼角色。行會的成員在某種程度下從唐代的政府監視之中解放出來。他們的商業活動不再局限於由城牆包圍的市場之中，或局限於政府規定市場開始營業的時間之內。商業與工業生產在此時是在城市的各處或城門之外進行，雖然同一行業的店鋪傾向於聚集在一起。（註11）

政府長期而且努力不懈地制定貿易規則及控制物質，相對的商人也同樣不懈地而且成功地逃避這些控制。國家試圖壟斷某些有利可圖的工業，卻必需付出代價，而且不太成功。但是宋代政府學習到彈性的收稅和限制其壟斷於一個工業的某些關鍵運作點；經由這種政策，政府竟能把利潤的一大部份收歸國庫。（註12）

這種政府的控制可能嚴重地遲緩了商業活動和力量的成長。但是當時

並沒有確實的證據證明這一點。較成功的商人得以累積大量的財富，他們的生活方式可以和皇子相比。在此之前，法律規定社會上每一階級人士應使用何種顏色。但是在九九五年之前，這種法律已無法執行，因此將其廢罷，只留下由帝室和高官才能用的深紫色之禁。然而數年之內，有證據說明即使這種顏色也被平民使用了。(註13)我們讀到關於大商人之家穿著珍珠和玉飾的記載。他們的車輿絡繹於道，以致當時人描述他們和顯宦之家“輻輳於途。”據說唐代有一個僕人竟敢批評他的主人，因為主人親自和商販討價還價。到了十一世紀，甚至高官也發現了商業的誘惑，不少人以商業活動與出差來增加他們的收入。精英份子的社交圈子接受了商人。透過這種關係，或透過他們的財富，有些商人獲得了官位，而且佔據了一些重要的位置。(註14)

但是，從商的人士仍然不能在社會的上升方面逾越某些障礙。較保守的學者仍然不接受他們。商人沉湎於奢華招致了批評，像一千年以前較溫和的商業發展所招惹的批評一樣。官員們批評他們以囤積致富；因為這樣做損害了窮人——無疑的也因為官員們認為應當由政府的壟斷來取得這些利益。雖然如此，保守派的埋怨本身可以說是另一種對於商業力量的承認，即其具有威脅官僚們主導地位的潛力；事實上，並非沒有關於商人對官員愈來愈大的影響的指責。(註15)

都市裏產生的新社會環境確實對於中國文化的演進有影響。除了最簡單的交易外，商業的運作至少需要起碼的文字知識，而都市的環境給予甚至最窮的人學習文字的機會。成功的和有野心的商人自然希望由教育贏得子孫們進入官僚機構。當新的都市讀者與較年長的學者競爭學習時，就產生了對書本的需求。在九五〇年以後一個世紀中，長久以來用木刻雕印佛經和善書的技術忽然有了新的用途，而在短時期內印刷的技術就使用到各種現存的文藝作品上去。

就教育程度低落的人來說，那時有各種娛樂活動，從雜技團、煙花表

演到木偶戲、皮影戲、以及簡陋的雜劇。透過這些公開表演所表達的故事，較精緻的文化的某些部份得以被文盲接受，因此有利於大眾分享文化傳統。在這方面特別重要的一點是說書人所扮演的角色：在市場中，失業的文人時常以對大眾講說歷史上戲劇性的一幕幕故事來維生。他們也寫一些話本來幫助聽眾，由此遂產生了後來偉大小說的雛型。同時，老舊的故事也由說書人用大眾的話語講出來，以取悅群眾，以致故事的內容反映了他們的觀點和品味。中國的通俗小說追溯到這個時期，可說是絕非偶然。（註16）

新的都市生活也影響到都市以外的社會。愈來愈重要的錢幣經濟應當確實地對日益複雜的農田問題有很大的貢獻。不同地區的農作物日益趨於專業化，導致農人常不能自給自足，因此在歉收的年月裡生計困難。雖然農人也許並不依賴都市來提供基本的日常用品，旅行的商人卻似乎已從都市到地方市集來販賣商品，如鹽之類，並且為都市的市場購物。都市的繁華在其他方面也對舊日農村的生活模式帶來削弱的影響。據說富農傾向於羨慕商人的生活方式；我們也聽說商業的盈利引誘貧農放棄了艱苦而無報償的勞動，賣掉他們的農田，加入經商的行列。（註17）

最後，我們應當注意官僚階級本身的變遷。也是在這一時期內，新的入仕程序將政府的職位向從來沒有如此多的人開放。於十一世紀初開始，為取士而舉行的競爭性的考試制度，擴大到了史無前例的程度。由精密技術的發展使考試更為客觀，新的考試制度進步到打破過去一小群北方貴族家庭保持的權力的壟斷，代替了這些貴族的新人的社會背景並不十分清楚。上文已提及教育的普及和易於獲得書本確實使機會的廣為分配成為可能。通常每三年舉行一次的最後的考試錄取幾百個應試的士子，據說在地方的初試時，幾百人才選出一個來參加上一層的考試，競爭是極為激烈的；而宋代競爭最劇烈而產生最多進士的地區，就是當時都市化最快的東南沿海地區。

有多少成功的士人來自大都市？有多少人可以追溯其受教育的機會到商人的家庭？目前仍然無法確定。但是從十二到十三世紀傳到今天的兩張進士題名錄所得到的資料可以知道，具有更多更大的都市集中的區域不僅產生了與此區域成比例的更多士人，也從每一家庭中產生了更多的士人，因此他們很明顯的霸佔了考試制度。還有，從人口增加最快的諸路，很顯然的產生了大多數的新血輪。這一結果是我們計算成功士人家庭中祖先沒有仕宦背景而得來的。這些人口增加得較快的地區的特色，是它們包括了沿海的大都市，以及位於內陸貿易路線上的都市。因此，在這裏我們有了一個看來是放寬了的官僚組織基礎和社會流動之間的環節，而這一環節也許正是這些都市在其最快速擴張的時期中的特點。

官僚組織的變遷性格在政治上的影響很明顯。文化上的影響也許較不具體，也較不易計算，卻也許是實在的。因為宋代是一個更通俗的文藝形式開端的時期，卻也是一個在知識活動方面極為活躍，而且在某些方面達到頂點的時期。這些知識活動由官僚們支持或參加：藝術、精緻的文學形式、和學術。在政府方面，宋代是具有創意的改革和實驗的時期。當時也見到好幾個科技方面的大發展。在所有這些領域中，東南人士的貢獻是很傑出的。

於是，我們證據確鑿地看到中國社會模式的真實改變是伴隨著大都市的興起而出現的。都市的影響從資產階級延伸到農人和官僚。即使官方的保守主義加以禁制的壓力，而且有時候不理會法律和詔旨，商人的影響力不斷的擴張，在變遷的時期開始時，打破了他周圍的很多阻礙。

商人興起也顯然有其限度。他在政府裏獲得一官半職，是他把自己變成官僚所致；作為商人，他並不能享受活躍的政治角色。職業的官員仍然地位崇高，而且對於私人經濟的利益的發展仍然頑固的不予同意。

十三世紀以後中國都市化的歷史，以及為何這一運動沒有再向前發展的理由，不在本文範圍之內。不過，當我們推測十三世紀資產階級的地位



時，很難發現任何一個單獨的不能超越的障礙阻止他們在社會中繼續上升。他們面臨的大部份的不利因素，也至少是中古後期或文藝復興時代一些歐洲的資產階級所面對的因素。在十三世紀裏，中國的資產階級以他們的意志和智慧展示，在有利的條件之下，傳統中國的社會模式可以經由內部力量的運作而得到重要的改變。

## 附註

註 1 本文是由一九五四年四月於遠東學會中傳統中國社會小組發表的論文改寫所成。

註 2 看 Stefan [ Etienne] Balazs, "Beiträge zur wirtschafts. geschichte der T'ang-Zeit, I," *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34 (1931), 19-20 所引八世紀中葉的人口數字；並看 Hans Bielenstein, "The census of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2-742 A.D.," *BMFEA* 19 (1947), 125-163；關於 1290 年的人口，看 Herberf Franke, *Geld and Wirtschaft in China unter der Mongolen-herrschaft* (Leipzig, 1949), 127-131；此一時期東南諸路則看 元史 (百衲本)，卷六十二。華南人口的增加是從七五〇年的約四百萬戶到一二九〇年的略少於十二萬戶。華南人口數字的最高紀錄(十七世紀以前)是一二二〇年左右的一千二百五十萬戶強(文獻通考卷十一，頁十八下至二十上；宋史，卷八十五，頁四上)。宋代人口數字中每戶人口甚少，引起很多討論。大約每戶平均五口應屬可能，但地方記載人口的方式不同，導致各地戶數口數之間比例不同。看加藤繁，支那經濟史考證 (東京：東洋文庫，1952-53)。華北人口從約一一一〇年的一千零五十萬降低到一二三五年的少於一百萬的紀錄似不可思議，但是元代記載亦支持此一數字(H. Franke)。